



中国古代的 监察官制度

☐ 熊 觉

监察官权威的保障

中国古代王朝的监察官受命于天，是皇帝的耳目，拥有监察、弹劾、审判甚至处置百官贪赃枉法、玩忽职守、矫制擅权、暴戾无度以及其它品行方面等职权；他们还可以对国家大政发表意见，评判朝政得失，可以直言极谏，纠正皇帝的过失；朝廷举行祭天敬祖、朝会等重大活动时，他们可以监察对每一位大臣的非礼言行；他们还拥有特殊情况下的随事处置权。

古代王朝还制定相关的法律规定，为监察官的监察活动保驾护航。从监察制度萌芽到创设之时，中国古代历朝历代便不断地完善对监察的立法，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监察官的权威。

对监察官的考核及约束

对监察官的纪律约束严于一般官吏。金代为防止结党营私，曾禁止监察官与其他官员非公事交往。然而这客观上阻碍了监察官了解情况，到章宗时放宽了。金代还严禁监察官巡察地方时“辄受讼牒”，不准与地方官宴饮或携妓游玩，违者杖罚。

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是古代中国政治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，监察官也为历代王朝加强中央集权、净化吏治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。

选任标准与程序极为严格

在监察官的选任程序上，两汉时大多由地方官察举推荐入选。为了保证御史不受牵制地行使弹劾权，隋唐时期改变了北魏以来由御史台长官选任御史的制度，而由吏部选任，但是唐代的吏部选拔实际上由宰相控制。到宋代，中央一级监察官多由“帝王亲擢”，而地方监察官则实行“台官自选制”，由中央监察官直接任命，监察权摆脱了相权的控制。为防止裙带关系，还会有一些关于任职资格的限制，实行回避，比如魏晋南北朝时规定大士族不得担任御史中丞，宋代规定凡经宰相推荐为官者或宰相的亲戚故旧，均不得为御史，明代规定巡回监察官应当回避原籍，或曾任官、寓居处等地。

享有广泛且明确的职权

监察官负责纠察和弹劾官吏的失礼、结党营私贪污渎职等不法行为。中国古代的监察官更统称为“御史”，最早源于西周官廷中跟随国军左右、记录要事的史官，战国时期的史官具有记录官员失礼行为、察举不法行为并报告国君的职责，此时的史官已具有纠察的性质。秦代在中央设置上下隶属、垂直领导的御史府，作为全国最高监察机关，以御史大夫为长官，协助丞相处理政务。御史中丞位列御史大夫之下，“内领侍御史以受公卿奏事，举劾按章，外领监察御史，以督州县”。直接隶属御史中丞的监察御史则在地方监察违法行为。秦代的监察制度尚属初级阶段，御史虽有纠察职权，但负有大量行政职责，不专职监察官吏。汉代承秦制，监察制度进一步发展，汉代御史大夫改为司空，御史中丞实际上负责监察，并监督法令的具体执行，建立御史台，成为专门监察机关。唐代有“六察官”制度，分察尚书省的吏、兵、户、刑、礼、工六部。宋代监察机关执掌“纠察官邸，隶正纲纪”等职权，并于地方建立通判，兼掌对地方官的监察。宋代的“六察官”由监察御史担任，明代时发展为六科给事中，成为直隶天子的独立监察机构。

监察官有司法监察权，以及参与大案要案审理的司法审判权。秦汉御史就有了司法监察权，南陈时建立朝廷重官会审制度，御史拥有了司法审

判权。唐代监察机关主要职责是监察中央及地方各级官员行为，同时参与大案要案的审理。唐朝时，恢复御史台，下辖台院、殿院和察院，三院御史均可行使弹劾权，监察官的重要职责之一便是台院参与案件审理（推鞠狱讼），御史台自设监狱，可以随时提审犯人。唐代设立了由尚书刑部、大理寺和御史台共同组成的“三司”，其共同审理的案称“三司推事”，审理涉及五品以上官员的大案要案。清代把三司推事扩大到九卿会审，即由刑部、大理寺、都察院加上吏、户、礼、兵、工各部以及通政司的官员共同审理重大案件。监察官参与案件审理，实际上是纠举权的延伸和深化。

监察官还拥有审计权，负责对国家财政收支进行审核监督，并稽查关防的不法行为。唐代的监察机关同时负责监督户部、司农寺、太府寺等重要财政部门的收支事宜，负责检查郡县的屯田、铸钱等内容。宋代设置转运使的屯田，既是监察官，又是掌管一路财赋的行政长官。到了明清，地方官要向巡按御史申明岁办税粮、差

雌龙》中表还说：“今之常言，有文有笔；以为无韵者笔也，有韵者文也。夫文以足言，理兼诗书；别目两名，自近代耳。颜延年以为，笔之为体，言之文也；经典则言而非笔，传记则笔而非言。”先贤撰文，单篇以呈，所以汉代以前无“集”之名，典型的文本集如《诗经》，单篇的诗作分散在15个国家，经过周朝文化官吏采风搜集而得3500余首，再经孔子删修而订数305首以成《诗经》，《诗经》属“经书”的典范文本，此后至于汉代没有类似《诗经》的“集”本。直到汉代，《汉书·艺文志》表彰刘向刘歆父子建立中国目录学的文献功绩，以“《略》之法度”开创了“集本书”。

四部承载民族精神

民族国家的精神怎样存在与运行？这是需要思量的问题。“经史子集”以典范而权威的书籍记述民族精神的悠久存在与运行，它们概括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实践与文化成就。从夏商周三代的“六艺”，到西晋荀勗的“甲乙丙丁”四部分类，再到东晋李充编制《晋元帝四部书目》的“《经史子集》”，再到唐代魏征编制“四部四十七类”而冠以“《经史子集》”之名，一直到清代乾隆诏令纂修《四库全书》，一路走来，四部成为辉煌的文化现实。

 中华春秋

活动从黄帝时代开始，表现为“动则左史书之，言则右史书之”，或者“左史记言，右史记事”。司马迁著《史记》，以《五帝本纪》的“纪”文体溯至黄帝之世；汉代学者宋衷著《世本》，将“封姓授氏”的文化史溯始于黄帝时代。史学发挥着伦理评判功能，因而历史学向天下昭示着公理原则。王夫之评论《春秋》时，突出了这一原则：“《春秋》，天下之公史，王道之大纲也。”《春秋》代表的编年史体、《史记》代表的纪传史体、《纪史》代表的纪事本末体、《尚书》代表的杂史体，开创了《四库》的史学体系。

子学展示民族国家的思想学说气象。“子”即思想家和学者人群，是传统社会士、农、工、商“四民”分工中的“士民”，开展“观念文化”生产是一国士子人群的文化本职。士有以下几个来源：首先是上古时期“学以居位”的文化学者，其次是“以道得民”的三代居官学者，再者是春秋时期官方和民间的学者。诸子百家之学则是这些学者“解读历史生活、了解改变现实、前瞻导向未来”的体现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·子部总序》赞誉说：“自六经以外，立说者，皆子书也。其初亦相沿，自七略区而别之，名品乃定。”

“文以述道”而兼“集众篇成一书”的文化精神生成了“集学”。“集学”包括诗词曲赋散文，作为传统集学的中国文学，将辞章文学划分为“文、笔”两类，具于韵律的诗词歌赋称为“文”，而不具于韵律者称为“笔”，刘勰在《文心

首，在于它昭示了华夏思想的常识和典范。华夏民族的历代圣哲，对于自然本质及其法则进行探赜索隐与钩深致远，对于社会体制与世道风气作制度规制的理论导向、对于人心性情及人文精神进行良知理性的教导培养，将以上领域概括成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易》《乐》《春秋》，称这六部书典为《六经》。《礼记·经解》记述孔子率先以《六经》之教，评估诸侯国家文化风气与民众精神文明水准：“孔子曰：入其国，其教可知也。其为人也，温柔敦厚，《诗》教也；疏通知远，《书》教也；广博易良，《乐》教也；絮静精微，《易》教也；恭俭庄敬，《礼》教也；属辞比事，《春秋》教也。”社会何以文明？在于国家崇尚文治，在于国民运用文化，在于意识观念进步。

那么《六经》昭示了哪些观念文化的原理呢?《庄子·天下》率先向世人揭示《六经》的原典义理:“《诗》以道志,《书》以道事,《礼》以道行,《乐》以道和,《易》以道阴阳,《春秋》以道名分。”《六经》概括了华夏社会生活的礼仪仪文与价值观念:《诗》以文学样式表达人的心志情意,《书》以史学文籍叙述社会生活往事,《礼》以礼仪仪文规约社会生活秩序,《乐》以音乐使人顺积于中而英华发于外,《易》以哲学理念剖判人文生活与自然阴阳关系,《春秋》以正统观念规制阶层关系。六经构成了与印度经典和基督教经典并行的中国原典。

史学示人以客观往事与历史认识。社会生活与史学观念联袂并行,是中国史学的特点。中国史官的著史

年轻时读书，很喜欢一首题为《观书有感·其一》的诗：“半亩方塘一鉴开，天光云影共徘徊。问渠哪得清如许？为有源头活水来。”此诗借源头活水阐发读书需要积累和不断思考的道理，景、情、理交融，没有半点书生气。

诗是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写的。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，院子小小的，房子毫不显眼，只因朱熹在此讲过学，因而名满天下。湘江有个朱张渡，原本不过是寻常的码头，由于当年朱熹与张栻论学时于此乘船，也成了胜景。

然而，朱熹晚年其实受到了严重的迫害。绍兴五年（1149年）8月底，宋宁宗做太子时的老师黄裳与彭龟年联名推荐朱熹，朱熹因此被皇帝起用为焕章阁待制兼侍讲。读书人有天下情怀，喜欢指点江山，何况现在还有了让天子直接听到的机会。刚入9月，朱熹即开始奏事。第一札希望宋宁宗正心诚意，第二札期待天子读经穷理，第三、四、五札论潭州善后事宜。10月14日朱熹奉诏进讲《大学》，反复强调“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天下”的重要性，希望以君德限制君权的滥用，宋宁宗内心很是不爽。此外，在他所上奏章里，也指责了韩侂胄窃取圣柄而使“主威下移”，韩侂胄千方百计想报复他，于是在背后煽风点火，朱熹在位子上只待了46天，宋宁宗就将他罢免了。

朱熹这个人只要有书读有学生教就很满足，从不将一个什么官职放在心上，罢了就罢了，还落得耳根清静。但韩侂胄不愿善罢甘休。庆元二年（1196年），此人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运动，那些溜须拍马的学者们一个个出场反复论证朱熹学说的伪学性质。当年12月，韩侂胄又唆使刚刚升上监察御史的沈继祖捏造朱熹

四部成为学科的过程

先哲在漫长的思想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创写出了“经、史、子、集”的原典。“经典”呈现中国思想对于自然法则、社会世运、人文精神的古典识见；“史籍”承载史家对于多元社会生活主体“前言往行”的记述；“子书”展示思想家学者对于自然现象、社会问题、人之心性的论说；“集书”汇聚历代文人所著文章和艺文赋咏。

“经史子集”蕴含着原典义理，它们在夏商周至战国末期经由圣哲著作成书，战国中晚期的诠释性著作也转化为原典，共同支持了“经史子集”的中国人文学科大系。魏晋时期以“甲乙丙丁四部”指称经史子集，唐代以“经史子集”指归观念文化的科目，清代以“四库全书”划分学科。

夏商周三代成书的经典即《六经》，以当时官方的文书语言写成；春秋至战国时段成书的子学文本，以思想家学者的个性语言写成；由汉及唐阶段的文本，以华美的文言章句写成；宋明以降的文本，以北方话与接近口语的古白话写成。各时段诠释，都是为了能够帮助社会成员更好地理解原典真理，因此，诠释是原初义理与后代理解相接通的语义桥梁。

四部各自的源流

经学能够居于《四库全书》之

有所思

学问比权力更长久

游宇明